



“金角”上的百年光影

文图/魏巍

天津滨江道上的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旧址,如今已是人气居高不下的网红打卡地,与劝业场、交通饭店等知名建筑比邻而立,成为游客探寻津门百年风情的必到之处。而鲜有人知晓,这座伫立在商业街“金角”的老建筑,不仅是近代中国建筑风格的经典样本,更是民族金融机构在动荡岁月中坚守使命的缩影。它的百年沉浮,镌刻着天津的商业变迁,凝聚着中国建筑师的匠心巧思,更承载着一份深沉而厚重的民族担当,在时光流转中,诉说着属于时代的故事。

百年建筑的匠心印记

20世纪30年代的天津,依托漕运与盐务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文化重镇。人口稠密、百业兴旺,各类银行遍布全城。彼时的近代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民族工商业势头正盛,建筑业迎来黄金时代,现代主义思潮悄然影响建筑风格,兼具西洋装饰与现代气质、简洁大气又保留对称美感的建筑,成为风格转型的鲜明标志,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旧址(以下简称“浙兴银行”)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之作。

这座由浙江财团经营的银行旧址,建筑面积约2034平方米,始建于1922年,选址在当时并不繁华的法租界梨栈大街,而非传统金融街解放北路。虽当初选址缘由已无从考证,但传闻正因这座银行的落成,买办高星桥才决定将劝业场建于此地,逐步成就了如今滨江道商业圈的繁荣。作为当时天津重要的金融枢纽,这里的股东多为政要名流,末代皇帝溥仪也曾在此存放巨款,见证了天津近代金融业的起落变迁。

尤为特别的是,这座建筑出自著名中国建筑师沈理源之手,这也是它区别于当时天津多数外国设计师作品的关键。沈理源是中国最早留学意大利的建筑师之一,1915年从意大利拿波里大学学成归国后,始终致力于将西方学院派建筑理论与中国本土需求相结合,古典复兴与折中主义是其作品最鲜明的特色。而浙兴银行,正是沈理源设计银行建筑的开山之作,它打破了外国人垄断天津重要建筑设计的局面,更给中国本土建筑师注入了信心。沈理源一生佳作迭出,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清华大学的故居新林院8号便出自其手。同时他深耕建筑教育,翻译出版的《西洋建筑史》,是我国建筑院系第一部中文版世界建筑史教材,作为天津大学建筑系

的创始人之一,他也为中国建筑业培育了大批人才。

从建筑细节中,更能窥见当年的匠心独运。这座三层混合结构大楼,平面呈倒三角形,略具轴对称感,围绕中心穹顶展开布局。外观遵循古典主义三段式构图,比例规整,主入口朝东南方,扇形转角处的叠柱设计格外醒目。首层用六根雄壮的多立克双柱围成凹陷门廊,既增加空间进深,又让建筑层次更丰富。二层的风雨露台搭配柔美的爱奥尼双柱,成为绝佳的观景廊道。从门厅到大厅,地面与墙壁均以大理石镶嵌,外檐拱券窗搭配精美浮雕,首层由青花岗岩砌筑,窗套与檐口的雕花精致细腻,檐口上方刻着的“浙江兴业银行”六个鎏金大字,尽显庄重与精致。首层交易大厅是整座建筑的核心,十四根意大利进口的深绿色大理石圆柱环绕四周,汉白玉柱头上雕刻的中国古钱币图案,巧妙融合西方柱式与中国元素。中心的大理石柜台保存完好,汉白玉狮首托举着柜台划分出功能区域,半球形钢骨架穹顶镶嵌着白色磨花玻璃,让整个大厅始终明亮通透、气度不凡。曾经,大楼二、三层是职工宿舍和阅览室,地下室设有保险库与食堂,如今连廊里还摆放着梨栈大街的老照片,静静留存着这座建筑最初的模样。

动荡岁月中的使命坚守

比起建筑本身的价值,浙兴银行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担当,更值得被铭记。这家银行始建于1907年,最初总行在杭州,1915年迁往上海,同年天津分行在老城厢官北大街成立,1925年迁至现址。自创办以来,“振兴实业”的宗旨在民族工商业艰难发展的岁月里,始终是其最坚实的后盾。近代商人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曾一度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当时自身资金并不宽裕的浙兴银行,毅然出资25万元伸出援手,助力民族棉纺织业发展。除此之外,它还大力扶持化工、面粉业、矿业、出版业等多个民族产业,就连钱塘江大桥建设期间,浙兴银行也联合中国银行等机构,共同出资200万元,为这项重大工程提供了关键的资金支持。

在革命斗争的艰难岁月里,浙兴银行还悄悄守护着革命火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时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李季达,为了保护革命者与党的机密,将重要文件以及天津500多名党员的名单,秘密存放在浙兴银行的私人保管箱里。正是这一举措,成功避免了天津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也让浙兴银行用自己的方式,为革命事业贡献了力量。

面对天灾人祸,浙兴银行始终心系民生、主动担当。1931年11月,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策划了“天津事变”,

便衣队暴乱导致市内交通断绝、商店停业、学校停课,一万多户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天津市商会紧急发起募捐,向银行同业公会筹措5000元,用于慰劳战士、救济灾民,浙兴银行积极响应,捐出263元。要知道,当时普通工人一天只能赚两角钱,这笔捐款相当于一名工人近四年的工资,这份诚意与担当,在当时格外珍贵。1939年8月到10月,天津遭遇特大洪水灾害,而日军故意加固租界堤坝、炸开杨柳青堤的恶行,让灾情雪上加霜,最终导致约65万人受灾、超10万间房屋损毁,直接损失达6亿元法币,溺亡与瘟疫致死人数超过1.2万。天津特别市公署紧急召集救灾会议,银行同业公会发起捐款倡议,共筹得2.6万元救灾款,浙兴银行再次挺身而出,捐出700元。彼时物价飞涨,1937年一公斤白面仅0.16元,到1939年已涨到16元,涨幅达100倍,这700元虽不算巨额,却能买到43.75公斤白面,为受灾民众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浙兴银行更成了民族文脉的无声卫士。1935年,日本侵略者不断制造事端,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攫取了华北大部分主权,随后又策动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文化侵略愈演愈烈。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爆发,时局变得更加动荡。第二天,梁思成致信时任浙兴银行总经理,也是被毛泽东称赞为“年轻有为的银行家”的项叔翔,他在信中提到:……因时局不靖,故将寄存北平图书馆先严藏书之一部,计六十四箱津运暂存贵行仓库。顷接舍弟思达来函,知已运库妥存。惟在租金方面,拟请每箱就四角之费,更酌量减底,因寒舍本不充裕,且此项存储本欲藉免文化遗产之为暴敌收没,故有不情之请,尚祈谅解。至于保险方面,拟按每箱五百元保,不知保费若干,祈与思达接洽是荷……”第二天,项叔翔即给梁思成回信:“敝行仓库之件计六十四箱已由弟与尊府洽妥,按每箱五百元保险,连同租金在内每箱每月收费三角业已办妥并将栈单交付尊府收执……”。这段简单的书信往来背后,是动荡年代里,浙兴银行与知识分子并肩守护国家文化遗产的民族大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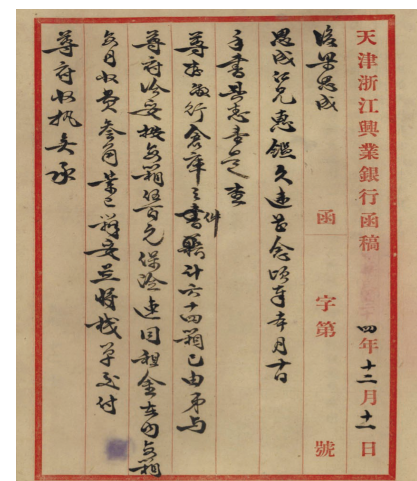
历史遗存的当代新生

如今,这座承载着百年记忆的建筑,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遗存,继续诉说着过往的故事。1997年,浙兴银行天津分行旧址被列入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它又入选“第六批中国二十世纪建筑遗产”,如今作为商业空间重新焕发活力,既记录着天津的城市变迁,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

事实上,以沈理源作品为代表的

近代天津建筑,它们的价值从来不止于建筑本身,更在于它们是时代的镜子,映照出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风貌。冯骥才曾在《抢救老街》一书中写道:“一个城市的街道,倘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株大树成百上千条的根须。城市愈大,其根愈茂……它与城市的历史一样漫长而悠远。人世间的苦乐悲欢,也是无言的见证,人们不断地丰富它,又施惠于人们,从古到今,从物质到精神,人们从老街可以找到的往日的东西真是太多了。”他认为,“今天的辉煌是一种实力,昨日的辉煌才是一种文化。”这句话,恰恰是对浙兴银行这类历史建筑最好的诠释。

老街旧巷和特色建筑已被视为不可再生的财富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挖掘、勘察历史遗存,维护、修缮现存历史风貌建筑已成为地方政府开发建设的先导,已纳入每年的投资规划。据文物管理部门介绍,对有价值的老街区、老建筑,基本坚持“抢救第一、保护为主”的方针和“修旧如旧”的原则,也就是说要首选“原物保护”。这个方法最原始,最有难度,最吃功夫,也最有效。古建筑保护的不仅仅是让其延年存在,重要的是能使人们通过历史遗存,感受历史的存在和对于今天的意味。而在城市的开发建设中,最常见的模式则是“原貌保护”,即对历史建筑形态及外观按原样修复,其建筑物的内部允许更新、允许改变用途,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浙兴银行与解放北路、意风区、五大道等区域的历史建筑,都是这种保护模式的受益者。正如杨新在《独乐寺观音阁建筑与维修的思考》中所说,古建筑保护的意义,不仅在于延长它的寿命,更在于让人们通过这些历史遗存,感受历史的存在与当代价值。而浙兴银行,正是这样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承载着民族记忆与时代担当的百年丰碑,它的故事,还将在岁月中继续流传。



天津市档案馆馆藏天津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致梁思成信函。